

论粮食的短线效应和中国的人口控制

张 敏 才

【提要】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较分析,认为由于受耕地资源等因素的限制,粮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短线地位,短时期难以改变,粮食增长的短线效应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存在着客观的要求,从而回答了中国经

济高速增长时期,为什么仍需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。

【作者】 张敏才 北京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,教授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,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%左右,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了15%以下;1992年、199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.8%和13.4%,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了12%以下。面对这种态势,有人提出,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10倍,还要从严控制人口增长吗?

回答是肯定的。这是因为人口增长,需要消费资料的全面均衡增长,才能与之相适应。经济增长往往不是各种产品全面均衡增长。近些年来,中国烟、酒、服装、钢铁、电力、化工、电子、高科技产品长足发展,而粮食增长就比较缓慢。把增长速度不等的产品比作长短不同的木板,围成木桶,用来盛水,尽管有的木板很长,但水的容量只能以最短的木板为准,水面超过最短的那块木板,水就要外溢了,这就是著名的短线效应。认清粮食问题对于人口增长的短线效应,采取相应对策,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该重视的问题。

一 中国的粮食缺口

1952年,中国粮食总产量恢复到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,达到3 278亿斤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,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,粮食总产量增长较快,1958年,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多亿斤。从1958年到1978年,由于生产队集体出工,集中管理,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用权,分配吃大锅饭,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,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,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,粮食生产增长很慢,其中60年代初期大幅度减产,政策放宽给予农民一些自由后生产恢复,60年代中期回升到1958年水平,又经过10年徘徊,到1978年,粮食总产仍在5600~6000亿斤之间浮动,人均粮食500多斤。全国10亿人口中有25 000万人处在人均年收入低于200元人民币的赤贫之中,常年不得温饱。农村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使农村生产力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。国家在保证城镇居民供应粮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,粮食收购价格提高20%,超额部分又加价50%,并且奖售平价化肥、农药、农膜等生产资料;“五五”期间,国家、地方和集体在兴修水利治理农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,80年代初期,这些设施正是发挥最佳效益的时期,加上天公作美,连年风调雨顺,灾害较少,从1979年至1984年,粮食生产连续6年以平均5.6%的速度增长,平均每年递增340亿斤,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 185亿斤,人均788斤,人均占有粮比1978年增加50%,农村贫困人口从25 000万,减少到12 500万。面对粮食超常增长的可喜形势,有人错误地认为,粮食

增长如此迅速，人口再多增加几千万也不成问题，因而对粮食生产和人口控制都有所放松；加上农村承包责任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，毕竟是小生产者有限的生产力，束缚一旦解除，能量全部释放，深化改革的步子跟不上，小生产的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。比如小生产限制了土地的规模经营，限制了农业机械化、电气化和先进技术的大面积使用；在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基础上，多余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转移，当然是正常和必要的，但不少地区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没有明确规定，有些农民承包的责任田自己不种也不转让他人，造成农田荒芜；农业生产资料大幅涨价，粮食价格未及时调整，农民议价种粮平价售粮，种粮比较利益偏低；“六五”、“七五”期间，国家和地方对农业的投入比例明显减少，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跟上，原有的设施年久失修，有的遭到破坏，抗灾能力下降；有些农民对承包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发，肥力逐年减退，增产缺乏后劲。由于上述种种原因，1985~1989年粮食生产再度出现4年徘徊，1989年才达到1984年的水平。此后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，调整了政策，加大了投入，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8700亿斤，创历史最高水平，但未完成“七五”计划年产9000亿斤的指标，人均占有粮738斤，比1984年减少40斤。1990年以来，粮食生产出现新的情况。有些条件好的产粮区，认为种粮效益不大，不如种经济作物，减少了粮田面积。有些条件差的贫困地区甚至觉得抓粮食生产费力大见效慢，种粮不如买粮，种粮不如吃国家返销粮，过多地强调发展多种经营，挤占了一些粮田耕地，因而粮食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。尽管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9128亿斤，人均占有只有770斤，仍低于1984年的水平。农村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没有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，国家连续5年净进口粮180亿斤。

中国粮食缺口有多大，人均占有粮达到多少斤才能称得上基本过关？我们以平均每人每天吃一斤成品粮计算，一年吃掉365斤，合原粮470斤；人均年消费肉食78斤、鲜蛋16斤，按每斤肉需要5~7斤饲料粮计算，共需饲料粮400斤；人均年喝酒耗粮40~50斤，副食、调味品、药品等用粮50斤；人均种子粮20斤，在收获、储运加工、播种和消费环节上年损失粮食1300亿斤，人均100多斤；这样算来，人均占有粮1000斤才算基本过关，最少也要达到人均800斤才能保证温饱，奔向小康。中国粮食生产如能按照规划顺利发展，到2000年实现总产10000亿斤的目标，人均也只有769斤粮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食物中肉、蛋、奶比重的增加，粮食需求量还要不断上升，缺口越来越大，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，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上扬及粮食部分进口，将难以避免。

二 耕地减少应当重视

目前，人类的食物主要还得依靠土地来提供。世界人均占有土地49亩，中国人均占有土地12亩，相当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/4。中国144亿亩土地中，耕地面积为14.9亿亩，人均1.24亩，也只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/4。

值得人们担忧的是，中国并不丰裕的耕地仍在逐年减少。1992年全国搞开发区2700多个，占用耕地1000万亩以上，有的土地占而不用，实际使用率仅2%。

耕地质量退化问题也十分严重。中国黄土高原、长江流域和南方丘陵地区水土流失严重，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.5%，预计到本世纪末，水土流失面积将扩大到170万平方公里，沙化的农田达6000万亩，中国还有盐碱地、低洼水涝耕地、旱地、缺磷、缺钾、磷钾俱缺、土壤板结的耕地，而且中国属于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，旱涝灾害覆盖面大，这些都制约着粮食亩产量大幅度提高。

三 出路在于“两手抓”

在中国，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，缺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大力抓好粮食生产，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当前，人口控制已成为全球性的行动，大部分地区已见成效，但人口增长的势能仍然十分强劲。现在世界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为16%，每年净增9 000多万人，1994年全球人口已达56亿，2010年将达70亿，2042年将达100亿，新增人口的90%以上在发展中国家，那时全世界的饥民将增至10亿以上，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。

中国人口控制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由于人口生产的惯性作用，庞大的人口基数，必然带来庞大的年均净增人口，1995年2月全国人口总数已达12亿。在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、很好的前提下，仍将以11%~12%的速度递增，年均净增1 400万人，到2049年，总人口在16亿左右，可望实现人口零增长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口总数至少还要增加4亿才能实现稳定，然后开始下降。

中国人口形势不容乐观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：（1）生育率下降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超前性。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，这是不容置疑的，但中国目前人均GNP和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，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，和非洲的肯尼亚差不多，肯尼亚的人口出生率、自然增长率、总和生育率都属于世界最高之列，而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发达国家水平，这就需要加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为出生率下降的物质基础作进一步的加固补牢。（2）出生率下降的骤然性。北欧、西欧各国出生率从30.0%下降到20.0%，一般经历50年左右，法国70多年，英国30多年，日本也用了20年。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5.44下降到1980年的2.24，只用不到10年时间。日本总和生育率从5.11下降到2.22用了31年，相当中国同水平下降时间的3倍。这都说明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是急促的，具有很大的反弹性。（3）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不平衡性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，国内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中，总和生育率在2和2以下的有8个省市，共有人口28 194万，占大陆总人口的24.94%；总和生育率在2.01至2.90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，共有人口79 462万，占大陆总人口的70.28%；总和生育率在3以上的有4个省区，共有人口5395万，占总人口的4.77%。城乡对比也可清楚地看出这种不平衡，城市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.2~1.3，是目前世界最低水平，上海已与人口长期负增长的德国一致，而农村总和生育率比城市高1倍多。再从育龄妇女文化程度看，高中程度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已达世界发达地区妇女的平均水平，文盲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比大学水平的高出1.66倍，农村育龄妇女文盲半文盲比例还相当大，也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因此，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必须一如既往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，既要保持原来的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，又要解放思想，深化改革，使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。同时，要下大力抓好粮食生产，加大农业的投入，严格依法保护耕地，只有一手抓好人口控制，一手抓好粮食生产，中国才能持续发展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徐培英）